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的转折

王健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区真正获得广泛重视的转折点是在清道光六年，而且与江苏巡抚陶澍等人组织的漕粮海运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前，地方士绅和沙船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正共同主导着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这种新型的绅、商结合的方式跟传统时代是迥然有别的，也是当时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突出表现。

黄道婆崇拜的历史及道光六年请祀事件

众所周知，黄道婆信仰是上海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地方信仰之一，根据元末文人陶宗仪和王逢的记载，元末时黄道婆最先将海南一带的棉种和纺织技术带入乌泥泾，繁荣了地方经济，因此在她逝世后，乌泥泾当地土人“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并为其立祠，以志纪念。

但事实上，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乌泥泾黄道婆祠屡屡复兴，影响范围并不是很大，其中除了明代成化年间曾由上海知县刘琬复建外，其余几次均是在乌泥泾本地士绅，特别是龙华张氏的主导下加以修建的。直至清代乾嘉年间，才有记载说当时上海城内渡鹤楼西梅溪弄也有所谓黄道婆祠，但根据乾嘉年间上海人褚华在《沪城备考》一书中的描述，该祠中所奉神像“如二十余女子，群呼之黄娘娘”，因此也有可能并非黄道婆。而嘉庆《上海县志》直接就说该祠实为黄姑庵，所供奉的神灵为织女。后来王韬在《瀛孺志略》中也据此认为“先棉与黄姑，当别为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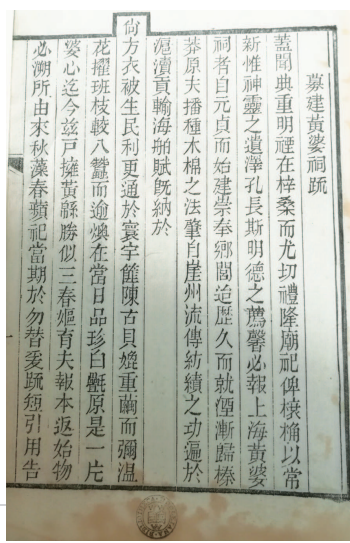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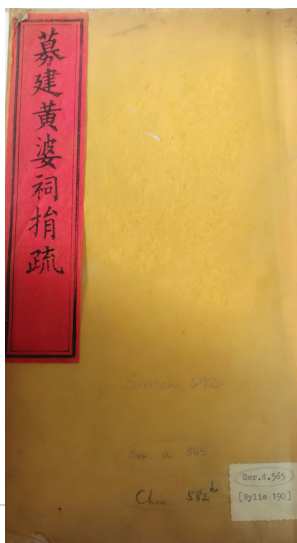
黄道婆信仰在上海地区真正获得广泛重视的转折点是在清道光六年，而且与江苏巡抚陶澍等人组织的漕粮海运密切相关。

当年由于运河阻塞，江苏巡抚陶澍在上海主持漕粮海运，获得极大成功，150余万石漕粮经海路，历时不到两月即抵天津塘沽口，漕米无所损失，史称“为都下所未见，中外庆悦”，这是清代漕运史上的一件大事。参与这次海运的沙船均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据说其中大号沙船就有1562艘，对上海而言，其实也是清代中期以来江南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上海的一次大展示和大预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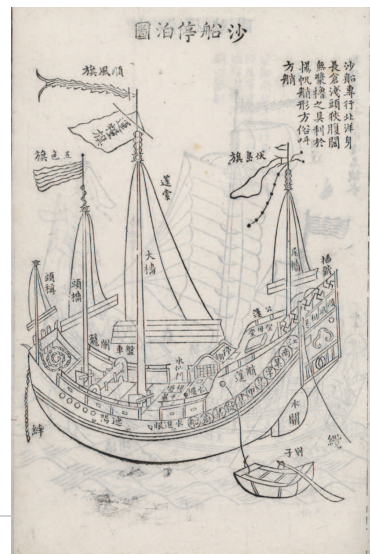
此次事件后，上海士民进一步



今上海植物园内黄母祠



←《募建黄婆祠捐疏》书影



→沙船停泊图

步饮水思源，将海运的成功归功于作为地方神灵的黄道婆，认为“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海疆产布，厥本黄婆”，所以黄道婆的功绩，已经远远超出“生养吾民”的范畴，而是有功于国家社稷，是“海运功臣”，于是部分地方人士联合申文上疏，请求将黄道婆列入国家祀典，由官方加以祭祀，以示庄崇。

但根据当年包世臣所撰《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的记载，这次请封最终却因“上官指驳，格于入告”而功败垂成，此后直至道光十年再次提出申请时，才得偿所愿。但关于道光六年请祀事件的具体过程，由于史料不足征，因此至今无从考据。

笔者最近在牛津大学博德

利图书馆获睹《募建黄婆祠捐疏》一种，陋见所及，应是至今为止黄道婆研究者所未曾寓目之史料。该书主要内容包括清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联名请求将黄道婆列入国家祀典的申文、从知县到督抚等各级官员关于此事的文移辩驳，以及地方士民的再次回应等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该次请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相关问题。

江苏学政辛从益的质疑

由《募建黄婆祠捐疏》可知，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联名呼吁将黄道婆祠列入祀典的请求

得到了从江苏巡抚陶澍到上海知县许榕皋等大部分地方官员的支持，主要持不同意见者为时任江苏学政的辛从益，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质疑：

首先，他认为无法确认黄道婆是否上海本地人。因为根据《辍耕录》的记载，只是说“国初有一姬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之具云”，并没有明确说她就是上海人。如果严格根据当时国家祀典的规定，非本地出生者是不宜列入官方祭祀系统的。

其次，当时棉花生产不仅盛行于南方，在北方亦“皆有此种，特为茂盛”，似乎很难与黄道婆联系起来。

再次，他认为当时往来于上海的海船，主要从事洋货贸易，其中只有部分船只“贩运木

棉”，因此将黄道婆称为“海运功臣”，有言过其实之嫌。

辛从益的质疑有部分的合理性，尤其是关于黄道婆籍贯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聚讼纷纭。但他的后两点质疑理由实则却正反映了当时清朝一般地方官员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不了解与某种程度上的隔膜。

因为正如后来上海官绅的回应所言，明清以降，北方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种植棉花，但是却“不能为布”，“皆有南方织成贩运”，所以“北土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而黄道婆的功绩不仅仅在引入棉种，更在教人纺绩，由此形成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